

《话语与修辞》专栏主持人语

田海龙

一般认为语言是人类思维和思想交流的工具,然而,当我们所处的社会从非真即伪的现代模式进入多元复杂的后现代阶段时,语言也更明显地成为人们参与社会生活以及构建社会事实和身份的手段。于是,“话语”较之“语言”得到了高频使用,社会语言学家也不满足于分析语言来判断语言使用者的身份和意图,而是热衷于摆脱这种“语言反映论”的束缚进入“话语建构”论的领地,为语言使用者提供可利用的话语策略和有价值的话语咨询。这虽然有些像古典修辞学为演讲者提供修辞支持,但现在毕竟不是两千年前的世界了。

当今世界处于全球化的时代。随着信息传播渠道的扩展和传播方式的增多,传播主体的多样和传播速度的加快,语言已不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工具,而是一个无时无处无所不在的可以利用的资源。广义的话语分析也好,狭义的批评话语分析也好,都对话语以及与话语搅在一起的权力、机构、意识形态、身份等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修辞学也不例外。《当代修辞学》2014 年第 6 期刊载的李红满和王哲对近十年西方修辞学研究论文的统计表明,“话语”作为高频高中心度关键词紧随“修辞”之后,为“政治”、“权力”、“身份”等词尾随,呈现出修辞与话语联姻的跨学科研究态势。

在这样一种学术背景下,“话语与修辞”栏目选登田海龙《新修辞学的落地与批评话语分析的兴起》,初步探讨了新修辞学与批评话语分析在思想渊源、研究课题及语言思想等方面的共同特征。赵芑《学雷锋活动中的修辞——基于批评话语分析的论辩策略》将“学雷锋活动”作为修辞事件,通过分析两组跨度 50 年的《人民日报》学雷锋社论和评论中的修辞策略,揭示了学雷锋活动 50 年既延续又具有各时期历史特点的话语动因。相信这两篇文章的初步思考和研究尝试会引发更多探索话语与修辞界面的研究成果。

新修辞学的落地与批评话语分析的兴起*

田海龙

(天津外国语大学语言符号应用传播研究中心,天津 300204)

提 要 新修辞运动与批评话语分析对语言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的重新认识源于后现代主义思潮对科学和理性的反思,也是语言学家较社会学家研究社会问题时更注重进行扎根的、具体的、详细的文本分析的结果。从修辞学与哲学围绕真理和认识等问题的争论入手,通过深入讨论新修辞学在跨学科性、批评性和语言分析性三方面与批评话语分析的结合,以及新修辞学和批评话语分析在语言思想和研究课题两个方面的共同点,本文旨在引发对后现代主义视域下语言研究更深入的思考,推动语言学的跨学科研究。

关键词 新修辞 批评话语分析 后现代 语言思想 研究课题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构建及其与国际学术话语的交流策略研究”(批准号 14BYY070)阶段性成果。

在 20 世纪中叶的北美大陆,以伯克(Burke)为代表的新修辞运动修正了把修辞看作演说和写作的附加物或添加剂的观点,认为修辞活跃和制约人的思想和行为,进而影响知识与现实的产生。在新修辞学试图将修辞更紧密地与社会生活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在欧洲大陆,范代克(van Dijk)、费尔克劳(Fairclough)和沃达克(Wodak)等语言学家正酝酿发起批评话语分析运动,试图通过语言分析来揭示社会生活中的不平等和种族歧视现象,进而认识话语对身份的建构、对事实的折射以及对社会活动的参与作用。在对新修辞学的评价中,有一种观点认为新修辞学没有值得称道的理论建树(如刘亚猛 2008),然而,这或许是新修辞学俯身向下做实际研究的一个证明(谭学纯 2014,高万云 2014),而这种“落地”在一定程度上也迎合了批评话语分析的兴起,形成美洲与欧洲学者开拓语言与社会研究的一种呼应与互动。

新修辞运动与批评话语分析对语言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的重新认识源于后现代主义思潮对“科学”和“理性”的反思,也是语言学家较社会学家研究社会问题时更注重进行扎根的、具体的、详细的文本分析的结果。本文中,我们将通过讨论修辞学与哲学关于“真理”和“认识”等问题的争论,进一步认识新修辞学运动与后现代主义的联系,通过讨论新修辞学在跨学科性、批评性和语言分析性三个方面与批评话语分析的结合,进一步认识新修辞运动俯身向下、扎根具体话语分析的特征。最后,我们将讨论新修辞学和批评话语分析在语言思想和研究课题两个方面的共同点,借此认识二者基于语言学话语分析和以问题为导向的研究特征。这些讨论或许对进一步考察后现代主义视域下的语言有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修辞学的发展及与哲学的争论

在西方学术界,修辞学的发展经历了古希腊、古罗马以及文艺复兴等时期,之后进入当代修辞学的繁荣时期。纵观西方修辞学两千多年的发展,它与哲学围绕真理、知识、语言等问题的争论从未停止过。可以说,正是这不断的争论推动了西方修辞学的发展。

例如,在古希腊修辞学中,普罗泰哥拉(Protagoras)的修辞术与柏拉图辩证术的争论第一次使修辞学形成系统。根据温科学(2006:4)的研究,智者派代表人物普罗泰哥拉认为“人是一切事物的尺度”,每一个人所感知的世界只能是透过他自己的感觉所体验到的世界。这实际上表明了智者派对真理的看法:既然每个人的感知能力和方法各不相同,对同一现象的认识便可见仁见智。因此,所谓真理的概念就值得怀疑,容许争论,而绝对真理则更是不太可能的,甚至是根本不存在的。对此,柏拉图提出相反的观点。他认为,修辞忽视真理知识,仅是讨好观众的美辞。这样,辩证术的真理原则与修辞术的可能性或可信性原则形成冲突。柏拉图的辩证术关心“认识(episteme)和真理”,而普罗泰哥拉的修辞术关心“舆论”及信念和个人意见。这一围绕真理与认识的争论,为亚里士多德把柏拉图的思想 and 智者派的传统结合起来提供了契机(温科学 2006:4),而亚里士多德将哲学和实用主义综合在一起的努力第一次使西方修辞学形成统一的体系。

类似的争论也发生在西方修辞学发展的古罗马时期和文艺复兴时期。例如,在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人文主义者推崇修辞艺术,认为只有通过语言人类才取得通向世界的途径,因而人类世界是通过语言建构的世界而不是自然的世界。与此针锋相对,理性主义寻求客观的、科学的、永恒的真理,认为演说在艺术上是愉悦人的,与科学和真理没有关系。于是,修辞学在理性主义者看来只是研究问题与表达的方法,而非学者应研究的哲学、逻辑和辩证法。

西方修辞学发展到 19 世纪,完成了它古典修辞学的发展,进入到 20 世纪当代修辞学、以

及 20 世纪 50-60 年代的新修辞学阶段。然而,关于真理的争论远没有停止。甚至可以说,正是这种争论导致了新修辞学的诞生。

欧洲进入 17 世纪,笛卡尔的现代哲学受到吹捧,科学与理性的思想成为时代的主流。进入 20 世纪,随着试图用自然科学的标准衡量一切事物的逻辑实证主义的盛行,人们普遍认为一切有意义的问题都可以通过科学手段得到实验检验,获得确定答案。然而,正如刘亚猛(2008:284)指出的那样,西方世界在自认为已进入科学与理性时代之后,接连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将亿万生命毁于一旦,残酷的事实使人们对科学思维方法能否解决人类面临的重大社会和道德问题产生疑问。西方思想学术界也开始从对科学理性不加分析的盲目信仰中醒悟过来,各种“反体制”理论于 20 世纪中叶开始风起云涌,对三百年来一直在西方保持统治地位的现代主义智力发起冲击,并在后现代主义的旗帜下汇集为新的主流意识。在这一时期,人们对所谓的知识、真理等问题的看法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哲学与修辞的边界不再那么泾渭分明,以致修辞学界打出了“修辞就是哲学”的口号。“新修辞学”就是西方修辞学在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对真理再认识基础上的发展。

二、新修辞学的诞生与落地

1. 新修辞学的诞生及与后现代主义的联系

关于新修辞学的起源,温科学(2006:35)认为是在 20 世纪 40-50 年代,或是 50 年代的冷战时期。同时,他也认为自 20 世纪 60 年代起修辞学研究引起多学科的关注,出现了一场革命性的变化,新观点、新思想、新批评层出不穷,西方修辞学才进入新修辞学的运动之中。刘亚猛(2008)也有类似的观点,但他对新修辞学起源的观察更为具体。在论及创建“新修辞”的努力有所突破时,刘亚猛(2008:315)提及了 1968 年发生的三件事情:1)“美洲修辞学会”正式成立并开始出版《修辞学会季刊》;2)得到官方和民间基金组织广泛赞助的“全美修辞学发展项目”正式启动;3)以探讨和建设当代修辞理论为己任的《哲学与修辞学》创刊。除此之外,他还提及了 1970 年在美国举行的两场研讨会以及 1971 年以《修辞学的前景》为名出版的一本论文集。我们认为,这些学术活动和纲领性文件标志着西方修辞学迈进“新修辞学”这样一个全新发展阶段。

新修辞学在理论上强调修辞的认识性。正如温科学(2006:37)指出的那样,新修辞学通过对修辞学与认识论关系的讨论使当代修辞学从狭义的劝说研究转向广义的对一切话语的研究。在新修辞学看来,历来被哲学认为具有绝对性的真理不再是形而上学思辨的产物,而是相对的、通过修辞的方式被发现的。在这个意义上,修辞一直被认为是演说和写作的附加物或添加剂的观点得到了修正。不仅如此,新修辞学提出“人类是修辞动物”的观点,认为修辞不仅是人类交往中固有的东西,而且活跃和制约着人的思想和行为,进而影响知识与现实的产生。换言之,交际与修辞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主体交互(intersubjectivity)的过程,即交际的主体通过修辞过程达到对某一问题的共识。新修辞学这些关于“修辞即认识”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了历史上修辞学与哲学的分离,不仅使其置身于大的后现代主义哲学背景之中并从中汲取养分,而且使得许多当代哲学家用新的眼光来看待修辞学,认为哲学研究离不开修辞。如果说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第一次把修辞与哲学联系在一起,那么,新修辞学则在更广泛的范围内使修辞学与哲学达成共识。

在许多对修辞感兴趣的哲学家中,福柯和德里达值得一提。田海龙(2009:42-47)讨论了福柯有关话语与知识建构的研究,从修辞学的角度来看,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福柯话语理论对新修辞学的贡献。温科学(2006:38)也指出福柯的话语理论与新修辞学的联系。福柯认为,知识是由话语生成的,而话语又必定是一种手段,是通过知识的运用来控制社会实践并保存习惯势力的手段。福柯的这些观点与新修辞学强调修辞制约人的思想和行为的观点一脉相承。关于德里达对新修辞学的贡献,温科学(2011:38)提到德里达坚定地认为语言并不是记录先它而存在的知识,而邓志勇(2011:80-85)则比较详细地讨论了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对实证主义以及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批判。可以肯定的说,福柯和德里达关于语言与知识的论述为新修辞学的语言思想提供了充分的营养。他们的哲学思想冲破了笛卡尔等现代主义哲学家将知识视作恒定、普适和超然信息的藩篱,把话语、语言以及修辞看作是形成知识的手段,是社会主体认识世界的一个重要方式。这些“反体制”的后现代主义思想把修辞推向了哲学研究的中心,并使得研究修辞的意识在人文科学各领域迅速蔓延和蓬勃发展,形成一种继哲学的语言转向之后的“修辞转向”(刘亚猛 2008:292)。

福柯和德里达的理论一般被认为属于哲学而非修辞学的范畴,但是,在哲学和修辞学的争论中,“他们实际上是站在捍卫修辞学这一边的”(温科学 2006:38)。不仅如此,作为后现代主义思想的代表,福柯和德里达对话语及语言在知识形成和社会交往中的作用的强调不仅捍卫了修辞学,而且为修辞学的重生和新修辞学的诞生提供了理论源泉。正是在对欧洲 17 世纪以来盛行的现代主义“理性与科学”的反叛背景下,20 世纪西方修辞学得以重振旗鼓,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这个意义上,完全有理由相信后现代主义思想是新修辞学运动的思想理论基础。

2.新修辞学的落地及与批评话语分析的结合

纵观修辞与哲学关于真理、知识等问题的长期争论,可以认为新修辞学是这种争论在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下的产物,因而是一个“新兴跨学科领域”(刘亚猛 2008:316),它不仅有自己的理论宗旨,而且有自己的出版阵地、专业组织和研究生培养基地。然而,新修辞学在实现其远大抱负的同时也承载了许多缺憾。根据刘亚猛(2008:315-321)对新修辞运动成败得失的讨论,新修辞学的缺憾主要表现在:1)其学科建设和理论建设发展不协调;2)新修辞特色研究具有局限性;3)新修辞缺失主体性;4)新修辞的跨学科本质属性与其学科身份之间也有冲突。这些缺陷,归根到底,主要体现在其理论建设层面。

自 1970 年新修辞学诞生以来,其理论发展可以说步履蹒跚,没有产生值得称道的理论建树。作为新修辞学的代表人物,伯克和帕尔曼(Perelman)的主要著作也都出版于 20 世纪 60 年代以前。他们的修辞理论为新修辞学奠定了基础,但是在他们之后,新修辞学科的理论探索除少数例外,基本上都是对源于古典修辞以及文化研究、哲学、社会学、人类学、语言学、心理学等现代学科的观点与视角的“应用性引申及阐释”,体现于新修辞特色研究的“理论兴趣往往比较狭隘,其观念基础也常常经不起推敲。”(刘亚猛 2008:317)

新修辞学理论建设方面遭遇的问题引起新修辞学者的反思,以至于一些学者发出使修辞回归老传统的声音,将修辞回到以帮助修辞者构思和发表富有说服力的演说范围之内。但是,这又与新修辞试图将其思考范围和研究视野扩展到整个话语实践领域的抱负形成冲突。不仅如此,理论建树的匮乏也使新修辞摆脱不了对强势学科的依附和对古典修辞的依赖。鉴于这

样的局面,难怪有学者感叹:“修辞学科连提升自身理论建设水平都有困难,遑论向其他学科提供用以解读和分析修辞现象的权威理论资源。”(刘亚猛 2008:319)

进一步讨论新修辞学理论建树的不足不是本文的目的。相反,指出其理论建树的不足恰是要说明新修辞学的重心不是“向上”发展新理论,而是“向下”开展具体实用的研究。艾森哈特与约翰斯通(Eisenhart & Johnstone 2008:2014)也注意到新修辞学这种从问题出发、“自下而上”进行系统地探索的研究倾向,指出新修辞学从具体的、实际应用的文章和谈话出发,而不是从抽象的话语模式出发,新修辞学重视由语境所约束的各种资源,而不是本末倒置,从理论出发去寻找支撑这种理论的证据(Eisenhart & Johnstone 2008:3)。实际上,许多修辞学家将自己的研究重点放在揭示演讲的策略和主体的动机方面。这些“俯身向下”、“接地气”的研究使新修辞学稳稳落地,扎扎实实地植根于具体的个案研究之中,在为新修辞学作出贡献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批评话语分析的兴起。

批评话语分析作为一种话语分析流派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发展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但是它的兴起却是和新修辞学同处人类思想史的一个发展阶段。当新修辞学在美国形成一个学科的时候,在欧洲大陆和英伦三岛,一些语言学家也在运用语言学的分析方法揭露在社会中存在的种族歧视和各种不平等现象,以致形成批评语言学和批评话语分析的语言学流派。根据田海龙(2006)的研究,批评话语分析经历了批评语言学(1979-1989)的前期发展阶段,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形成。与新修辞学一样,批评话语分析的形成也有一些标志性成果,如1989年出版的费尔克劳的《语言与权力》和沃达克的《语言、权力及意识形态》,1990年范代克创刊的《话语与社会》杂志,以及后来成为批评话语分析大家的范代克、沃达克、菲尔克劳、克瑞斯、范柳文等人1991年在阿姆斯特丹大学召开的学术会议。除此之外,1992年出版的费尔克劳的《话语与社会变革》以及1993年出版的《话语与社会》杂志的“批评话语分析”专刊,都对批评话语分析的形成起到了推动作用。

从体系形成的角度来看,新修辞学诞生于1968-1971年,批评话语分析形成于1989-1993年,即使将批评话语分析的形成追溯到1979年的批评语言学,它的形成也晚于新修辞学10年之久。但是,这丝毫不影响二者同处于西方后现代主义对结构主义语言观的反叛大潮之中。而且,新修辞学和批评话语分析还有着实在的或潜在的结合点。

1)跨学科特征 新修辞学和批评话语分析在跨学科的特征方面有着实实在在共同点。首先,二者的理论基础都来自后现代主义哲学。关于新修辞学的理论源泉,刘亚猛(2008:292-293)曾指出,使20世纪“新修辞学”获得其理论形态的学者几乎没有一个具有修辞学科正式成员的身份,而是那些出身于文学批评、法学、哲学、社会学等非修辞学科但又具有超越某一具体学科的开阔视野、不以修辞学家自命的“杂家”。刘亚猛(2008:321)曾经以伯克为例进行说明,指出伯克“从来都是以杂家的身份,从一个跨学科的视角探讨所关心的问题。他的思想不管是被称为‘文学批评’还是‘修辞理论’,都是哲学、文学、社会学、人类学、语言学、历史学、新闻学、心理学等不同学科研究成果的融汇和综合。”在这一点上,批评话语分析与新修辞学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批评话语分析不仅借助语言学理论,而且从社会科学汲取营养,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福柯、拉克劳和墨菲、巴赫金等的理论(参见田海龙 2009:41-51, 2014:43-46)。批评话语分析的跨学科性还体现在它的研究方法、研究团队和研究课题等多个方面。不仅如此,跨学科性在批评话语分析中还被创造性地发展为“超学科性(transdisciplinarity)”,意即一个学科的理论可以被运用到另一个学科的发展当中,而后一个学科则没有必要淹没在

前一个学科当中(Chouliaraki & Fairclough 1999; Chiapello & Fairclough 2002)。

2)批评性特征 批评话语分析的批评特征直接而明显地体现在它的名称上面,它的倡导者也公开宣称批评话语分析的的目的就是要通过对社会实践话语层面的分析揭露社会中的不平等,进而导致社会变革的发生。实际上,批评之于批评话语分析,意即“将文本中隐藏的意识形态意义明朗化”,这与批评在新修辞学中的含义十分吻合。例如,伯克的戏剧主义修辞批评就是“试图找出人们在何种场合下为何做某事”(邓志勇 2011:54)。伯克将语言或象征行动看作戏剧,并对人们语言运用(修辞)中的戏剧要素进行分析,以解释修辞者的动机、行动、象征世界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在批评这个特征上面,新修辞学和批评话语分析都体现出它们对社会问题的热切关注。批评话语分析对种族歧视话语的分析,以及新修辞学对女性和黑人修辞的分析,都体现出两个领域的学者希望通过自己的学术研究解决社会问题的强烈责任意识。

3)语言分析特征 不论是新修辞学对修辞者动机的分析,还是批评话语分析对隐含在话语实践中的不平等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的揭露,它们都十分注重通过语言学分析来达到研究的目的。例如,伯克的戏剧主义修辞批评就是在“通过对话语的戏剧性分析找出其背后隐藏的修辞动机”(邓志勇 2011:166),而且这种分析有着操作性很强的分析步骤。根据邓志勇(2011:168)的归纳,伯克的戏剧五要素分析法包含三个步骤:第一,确定所研究的修辞行为涉及的诸如作者、动作、场景、手段、目的这五个要素;第二,通过分析这五个要素组成的关系找出主导因素;第三,从主导因素出发解构该话语的语篇构建,挖掘出其背后隐藏的修辞动机。批评话语分析也提出了操作性很强的分析步骤。例如,批评话语分析的代表人物费尔克劳提出“关系-辩证”分析方法的五个步骤,并且在实践层面上特别强调对语篇(即符号本身)的分析应该包括:分析话语秩序的“结构分析”和分析互语问题和语言符号的“互动分析”。批评话语分析另一位代表人物沃达克也提出“语篇-历史”分析的操作步骤:1)确定某一特定语篇的具体内容和主题;2)研究语篇与语篇之间和文本与文本之间的关系;3)对语体和文本实际运用的意义进行分析。

三、新修辞学与批评话语分析的共同关注

新修辞学没有“向上”发展出什么新的、值得称道的理论,但是它“向下”研究了许多具体问题,而且在这些具体的研究案例中体现出重视对文本和谈话语言细节的详细分析。在这一点上,我们完全可以说新修辞学与批评话语分析有着异曲同工的作用。新修辞学与批评话语分析在语言思想和研究课题两个方面有许多共同点。

1.共同的语言思想

在表1中(见下页),我们可以看到,新修辞学所持有的语言思想在表中列出的九个方面都可以与批评话语分析产生共鸣。例如,修辞就是认识的思想,与批评话语分析将话语视为社会实践(Fairclough 1992, 2003)的思想一样,都认为人的语言活动是人们获得知识和参与活动的手段,这一语言思想体现出二者对知识动态性、话语建构性等后现代主义思想的高度认同,使我们看到,在新修辞学强调真理在交际中产生的同时,批评话语分析也在强调社会事实在话语实践中建构。

后现代主义思想在语言研究领域体现在对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思想的批判,并形成后现

新修辞学	批评话语分析
修辞即认识	话语即社会实践
真理在交际中产生	现实由话语建构
以后结构主义为思想基础	以后现代主义为思想基础
关注政治行为与知识产生	关注政治行为与知识产生
关注意识形态和权力问题	关注意识形态和权力问题
开展修辞批评	开展话语批评
主题互联 / 互文性	主体间性
修辞策略	话语策略
修辞事件	话语事件

表 1 新修辞学与批评话语分析的语言思想

代主义的一个分支,称为后结构主义(Baxter 2003:6)。这解释了新修辞学以后结构主义为基础,实际上和批评话语分析以后现代主义思想为基础如出一辙,而二者都关注政治行为与知识产生诸问题则可以在下面列举的二者关注的研究课题中可见一斑。李红满和王哲(2014)对 SSCI 数据库 2004-2013 年收录的西方修辞学研究论文进行统计,发现“政治”、“权力”两个词“均属高频高中心度的关键词”,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新修辞学与批评话语分析兴趣点的重合。除此之外,批评话语分析注重分析话语运用中的意识形态问题,这也与在新修辞学对女性与修辞、黑人与修辞以及修辞与政治的研究中关注意识形态问题(参见温科学 2006:90-92)有所相同。这方面,最近的一个有参考意义的研究是邓志勇和崔淑珍(2013)提出的一个意识形态修辞批评操作模式。另外,与批评话语分析的“话语批评”注重社会变革的实践性(赵芃、田海龙 2008)相呼应,新修辞学的“修辞批评”试图通过对论辩双方的行为进行规范和约束来消除不平等关系的话语暴力,在这方面,荷兰学者范艾莫伦(van Eemeren)等提出的“批评性讨论十戒”(参见刘亚猛 2008:309-311)很有代表性。

新修辞学和批评话语分析都非常注重对文本和谈话的具体语言学分析,这就包括对文本中的互联、互文及主体间性的分析。在这方面,二者都通过对文本语言层面的分析探究文本使用者的目的及意图。除此之外,二者还特别注重对语言使用者(如传统修辞关注的演讲者和批评话语分析关注的政治家)使用语言的策略研究,尽管新修辞学称为修辞策略,而批评话语分析称之为话语策略。最后,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新修辞学和批评话语分析的研究对象已不局限于文本,而是把有语言运用镶嵌其中的事件(不论是称作修辞事件还是话语事件)作为观察的对象。例如,胡范铸等(2013)关于“新言语行为”的论述,认为修辞是一个包括我、你、他三方主体、以及叙述、接受、核查、驱动四种话语角色活动的过程。在这方面,批评话语分析更是把研究的对象扩展到围绕一个事件的一系列话语活动,如田海龙(2014:199-214)通过对政府征求意见稿发布前后的一系列不同语体的分析。这样的分析比仅就一个文本的分析更能清楚地认识话语在所研究事件中起到的作用。

2. 相关的研究课题

就批评话语分析的研究课题而言,布鲁马特(Blommaert 2005:26-27)认为这些研究课题集中在政治话语、意识形态、机构话语、身份研究和社会变革等方面。田海龙(2009:177-178)

曾经对《话语与社会》2006 年全年发表的 28 篇论文进行归纳,发现批评话语分析的研究课题大致涉及性别研究、媒体研究、政治研究、权力研究、社会生活以及具体国家的问题研究等方面。可见,批评话语分析的研究课题一般涉及政治、机构、媒体、社会、性别等方面的话语实践,以及这些话语实践中体现的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

新修辞学的研究不再像传统修辞学那样重视演讲和辩论的精细构思、绚丽风格和逻辑推理,而是追求通过修辞来揭示社会、认识真理,进而赋予修辞手段以认识和构建的功能,如认为风格具有建构的特性而非仅仅是修饰,以及隐喻具有创造知识的作用而非仅仅是一个事物的别名。在媒体话语分析方面,邓志勇和胡敏对《时代周刊》和《经济学人》刊发的对 2008 年 3 月 14 日发生在我国拉萨的一系列打、砸、抢、烧等严重犯罪事件的报道进行对比分析,发现《时代周刊》的报道偏离事实,而《经济学人》的报道更侧重于对事件发动者具体行为的描述(见邓志勇 2011:165-179)。这个研究与批评话语分析对媒体新闻报道的许多研究一样,关注媒体报道中体现的意识形态意义,以及媒体报道的动机。所不同的是,这个研究运用的分析方法不是批评话语分析经常使用的系统功能语法,而是新修辞学代表人物伯克所创始的戏剧主义修辞批评的戏剧五要素分析法。

实际上,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已成为新修辞学的一种特征。许多修辞学者遵循“修辞即是认识”的信条,通过分析政治话语、媒体话语以及各类话语中的修辞来认识社会、揭示那些隐含的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在这方面瑞提瓦(Ritvoi 2008)对文体的变动和变化如何建构政治主体和政治活动的讨论值得一提。瑞提瓦探索了在冷战时期一个流亡的所谓罗马尼亚政府首脑如何运用微观修辞策略(传统上被认为是文体选择)来创造一个政治合法性的氛围。她的分析显示出这个首脑给美国政府代表写的信如何策略地运用动词的及物性传递坚定的态度与自信,以及如何策略地运用语言的情态系统来描绘罗马尼亚避难者在他的领导下团结一致。她(Ritvoi 2008:54)指出,这个流亡政府首脑之所以能够使美国政府对他的这个流亡政府关注 20 年,不仅是因为这个首脑具有吸收美国意识形态的能力,而且是因为他策略地把他的这个能力应用于话语实践上面。

四、结 语

批评话语分析借助语言学分析方法,通过对语言结构的分析揭示政治话语和媒体话语中的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尽管这使修辞学的观察视野不再局限在辞格和风格的传统之内(Ritvoi 2008),进而体现为批评话语分析对修辞学的贡献,但也有学者(如 Fairclough 2014)认为批评话语分析对政治话语的研究也需要借用传统修辞学的分析工具,侧重分析那些具体的论证和推理。毋庸置疑,批评话语分析与新修辞学都重视对社会生活中实际运用的话语进行具体、详细的分析,都试图通过这种“扎根”的文本分析探究话语背后的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这确实开启了继 20 世纪结构主义主流语言学之后语言研究的又一个新时代。与美洲大陆其他语言学流派(如互动社会语言学、人类语言学)一道,源自欧洲的批评话语分析,连同构成其产生沃土的哈贝马斯、福柯、德里达的语言哲学,共同形成了世界性的后现代主义背景下的语言学研究新纪元。这里对新修辞学和批评话语分析的讨论,或许会对我们认识这一点有所启发。

注 释

关于戏剧五要素分析法的详解及应用案例,可参阅邓志勇(2011:169-179)。篇幅所限,这里不再赘述。

关于费尔克劳的“关系-辩证”方法的详解和应用案例可参见田海龙(2009:140-152);关于沃达克的“语篇-历史”分析方法的详解和应用案例可参见田海龙(2009:152-165)。

参考文献

- 艾森哈特、约翰斯通 2014 话语分析与修辞研究,田海龙译《当代修辞学》第6期。
- 邓志勇 2011 《修辞理论与修辞哲学》,学林出版社。
- 邓志勇、崔淑珍 2013 基于意符的意识形态修辞批评:理论与操作,《当代修辞学》第6期。
- 高万云 2014 广义修辞学研究范式: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当代修辞学》第2期。
- 胡范铸、陈佳璇、甘莅豪、周萍 2013 “海量接受”下国家和机构形象修辞研究的方法设计,《当代修辞学》第4期。
- 李红满、王哲 2014 近十年西方修辞学研究领域的新发展——基于SSCI的文献计量研究,《当代修辞学》第6期。
- 刘亚猛 2008 《西方修辞学史》,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 田海龙 2006 语篇研究的批评视角:从批评语言学到批评话语分析,《山东外语教学》第2期。
- 田海龙 2009 《语篇研究:范畴、视角、方法》,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田海龙 2014 《批评话语分析:阐释、思考、应用》,南开大学出版社。
- 谭学纯 2014 融入大生态:中国修辞学研究突围十年回顾与反思——基于广义修辞学的学术逻辑和学术实践,《当代修辞学》第2期。
- 温科学 2006 《二十世纪西方修辞学理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赵芃、田海龙 2008 批评性语篇分析之批评:评介与讨论,《南京社会科学》第8期。
- Baxter, J. 2003 *Positioning Gender in Discourse: A Feminist Methodology*. New York: Palgrave.
- Blommaert, J. 2005 *Discourse: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hiapello, E. & Fairclough, N. 2002 Understanding the New Management Ideology: A transdisciplinary Contribution from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and New Sociology of Capitalism. *Discourse & Society* 13(2): 185-208.
- Chouliaraki, L. & Fairclough, N. 1999 *Discourse in Late Modernity: Rethinking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 Eisenhart, C. and Johnstone, B. 2008 Discourse Analysis and Rhetoric Studies. In B. Johnstone & C. Eisenhart (eds.) *Rhetoric in Details: Discourse Analyses of Rhetorical Talk and Text*.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3-21.
- Fairclough, N. 1992 *Discourse and Social Chang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Fairclough, N. 2003 *Analysing Discourse: Textual Analysis for Social Research*.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Fairclough, N. 2014 Review of Siobhan Chapman's *Susan Stebbing and the Language of Common Sense*. *Discourse & Society* 25(3): 408-411.
- Ritivoi, A. D. 2008 Talking the “Political” Talk: Cold War Refugees and their Political Legitimation through Style. In B. Johnstone & C. Eisenhart (eds.) *Rhetoric in Details: Discourse Analyses of Rhetorical Talk and Text*.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33-56.